

# 日本社会学第60次大会述评及 对中国社会学的反思

张 萍

1987年10月2~3日,日本社会学第60次大会在日本大学召开,笔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会议,下面仅就日本社会学学会的发展,这次会议的规模、内容和特点等作一简单介绍。

明治初年,斯宾塞、孔德的理论被介绍到日本以后,日本即开始了对社会学的研究,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13年,将孔德的社会学说与儒家的社会观融为一体的建部遯吾<sup>①</sup>创立了日本社会学院,这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研究组织,即日本社会学学会的前身。该学院在成立初期共有会员415名,以后每年定期召开研究年会,出版会刊《日本社会学院年报》。1923年,日本社会学院解散,成立了日本社会学学会,会刊易名为《社会学杂志》(1924~1930),以后又相继易名为《季刊社会学》(1931~1932)、《年报社会学》(1933~1943)、《社会学研究》(1947~1948)等,1950年定名为《社会学评论》(季刊)。截至1987年10月,《社会学评论》已出版了38卷共150期。从1925年起,日本社会学学会每年定期举办会议,为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研究生等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封建法西斯专制政府的压制,日本的社会学研究曾一度陷于全面停滞状态,学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也被迫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0年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民主主义运动的进展,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得以恢复,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57年,日本社会学学会已有会员870名,并且成立了东北、关西、西部、关东、北海道等地社会学学会,加入了国际社会学会。<sup>②</sup>1983年,日本已有49所大学设立了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与社会学有关的民间研究机构也发展到67个,学术刊物除了《社会学评论》以外,还有各个大学及研究机构出版的十余种杂志。<sup>③</sup>据日本社会学学会第60次大会召开时即1987年10月2日的统计,该会已有会员2 044名,比1950年代增加了两倍。

① 建部遯吾(1871~1945),日本社会学早期的著名学者。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专业,1898年去欧洲学习社会学,1901年回国任东大教授,1922年退职后活跃在政界,曾任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主要著作作为四卷本的《普通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社会学十讲》。

② 参见福武直等主编:《社会学辞典》,日本有斐阁,1967年,第699~700页。

③ 参见北川隆吉主编:《现代社会学辞典》,日文版第691~696页,日本有信堂,1984年。

与中国社会科学各种学会的年会相比,日本社会学会年会的规模很大,这次会议有971人到会,其中会员为835人(包括144名研究生会员<sup>①</sup>),非会员为136人(在日的外国社会学学者、学生以及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业四年级学生、研究生等)。两天共召开了68个一般报告分组会,230余人发表了研究报告<sup>②</sup>,另外还举办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性别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论”、“市民生活与计算机”四个专题分组会,<sup>③</sup>有12人作了报告。从这次会议的240余篇研究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学研究目前有如下一些特点和动向:

第一,没有自己的理论至今仍是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日本自开展社会学研究以来,解释或介绍欧美各国社会学理论的倾向就很强。1900年以前即日本社会学的草创时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斯宾塞的理论;1900年以后,人们的兴趣转向了孔德以及德国的形式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1950年代以后至1960年代中期,对日本社会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196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欧美批判帕森斯思潮的高涨,帕森斯理论在日本也丧失了主导地位。1970年代以来,从整个欧美社会学界的情况来看,至帕森斯热过去以后,至今尚未出现一种能够起主导作用的理论,正处于理论的休眠状态。日本社会学由于在理论上紧随欧美,因此也与欧美社会学界一同陷入了没有主导理论的状态。近年来,日本的一些中年学者已经认识到日本社会学在理论上的贫乏,他们努力研究和综合欧美的各种社会学理论,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以打破追随欧美的传统。但是,从这次会议中发表的有关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报告(约占报告总数的1/3)来看,除了几篇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研究和一篇关于日本社会学家梯明秀理论的研究以外,大部分报告不是解释或介绍欧美社会学家如G·H·米德、齐美尔、韦伯、迪尔凯姆、戈夫曼等人的理论,就是试图用欧美某位社会学家的某个或几个概念来解释日本社会的一些现象。可见,在理论上没有独创性仍是日本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缺陷。而且,从日本社会学界目前的状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发展趋势来看,似乎短时期内很难扭转这种一边倒向欧美理论的倾向。

第二,总的来看,日本社会学家现在仍很注意经验调查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但年轻一代已露出重理论轻调查的端倪。在日本社会学界,开社会调查之先河的是1929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的户田贞三。<sup>④</sup>他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专业(主修社会学),之后去美国和欧洲留学两年,回国后把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介绍到了日本,并于1933年出版了《社会调查》一书,这是日本第一部系统论述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他的“社会学是经验科学而不是思辨的社会哲学”的思想,在使日本社会学研究由思辨转向实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带领下,日本社会学界从1933年开始对家庭和农村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但是,1945年以前,由于当时的专制政权的压制,日本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仅局限在家庭和农村问题方面,1945年以后才得以自由展开。从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内容来看,日本的经验研究已涉及到

① 具有研究生以上资格者方可加入日本社会学会。

② 从1987年4月起征集论文,截至8月,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论文提纲的人均可在会上作报告。

③ 一般报告的分组是根据征集到的论文的内容确定,而这四个专题的题目是学会确定的,报告人也是学会指定的。

④ 户田贞三主要从事家庭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家庭之研究》、《社会调查》、《家庭与婚姻》、《家庭结构》等,1940年日本社会学建立会长制度以后,为第一任会长。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文化、社会运动、产业、劳动、社会意识、社区、城市、农村、阶级与阶层、宗教、老人、妇女、青少年、家庭、第三世界发展研究等无所不包,而且能够及时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近几年来,东京土地价格上涨很快(房租也随之上涨),1987年比1985年平均上涨了两倍以上,给东京一部分市民特别是那些尚无私人住宅的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早稻田大学的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地价高涨引起的东京市内居民生活的变化及居民对土地问题的看法”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根据笔者的观察,从这次会议各个分组会的到会人数来看,“阶级与阶层”、“老人”、“家庭”、“城市”、“开发与发展”五个问题似乎是日本多数社会学家目前所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在笔者所接触的学者中,有些50岁以上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对日本社会学界经验研究的现状并不满意,他们认为与1950年代相比,现在的社会调查显得浮浅,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尤其令他们担忧的是,目前有些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做社会调查,也不知如何调查,只喜欢呆在象牙塔中钻研那些“高深晦涩”的理论或数理模型。笔者认为,日本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年轻一代中确实存在着重(欧美)理论(洋)、轻(日本)实际问题研究(土)的倾向,如何克服这种“洋”与“土”的矛盾,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也是日本社会学界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研究正逐渐成为日本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日本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从1970年以来开始的,如关于非洲的研究,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农村的研究等等。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在1945年以前进行的,较为著名的有清水盛光<sup>①</sup>和牧野巽<sup>②</sup>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及宗族的研究,福武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迄今为止,很多日本社会学家对中国特别是旧中国农村及家庭的印象几乎都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得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一方面由于中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中断,日本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一直没有恢复。1979年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恢复以后,当时日本社会学会的会长福武直先生立即率日本社会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与中国的社会学界进行了交流,并在1980年创立了“日中社会学会”,当时有会员34名,1987年已发展到80名。在1980年以来的日本社会学会的年会上,每次都有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报告,最初只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探讨,1982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发展,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农村、城市、家庭、社会学史等方面。老一代日本社会学家多数对中国农村的家庭特别是宗族问题感兴趣,试图把今天的研究与战前的研究衔接起来;年轻一代关心的主要是中国今天的现实,特别是经济改革以后社会的变化。这次会议共有4篇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两篇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两篇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尽管报告的内容很简单,但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有什么差距”、“中国现在的宗族在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都研究了一些什么问题”等等。由于报告者对中国的情况还知之甚少,许多问题都未能给予回答。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可以预见,随着中日社会学交流的发展,新一代日本社会学家

① 清水盛光(1904~ ),1931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在该大学任助教后进入日本满铁调查部从事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家庭的研究,194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支那社会之研究》、《支那家族的结构》、《中国族产制度考》、《中国乡村社会论》等。

② 牧野巽(1905年~1974年),192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专业,1949年任东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支那家族研究》、《近世中国宗族研究》等。

对中国的研究一定会逐渐恢复到和超过战前的水平。

### 三

通过参加日本社会学学会年会，考察日本社会学的发展，也看到了目前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与日本对欧美社会学介绍过多相反，我国的社会学研究由于刚刚恢复，对欧美社会学特别是那些较重要的社会学家还缺乏系统的介绍和研究。笔者认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必须了解世界各国社会学的历史及理论，因此，系统地翻译重要的社会学著作，培养专门人材研究主要国家社会学的历史及现状，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第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我国社会学的历史，并将其介绍到国外，也是我们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国内已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力量似乎还显得太单薄。据笔者观察，日本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及历史很缺乏了解，以为中国过去除一两个人搞过一点社会调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象样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中国社会学的起步虽比日本晚些，但从解放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其规模和成果（尤其是社会调查）并不比日本差很多，现在的发展也很快。现在日本已有一些年轻的学者把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加强对我国社会学历史的发掘、整理、研究和介绍工作。

第三，通过参加日本的这次学术会议，笔者感到我国学术会议的开会似乎需要改革一下。日本人的务实精神也体现在学术会议上。这次会议只有两天，但却聚集了日本全国1/3的社会学研究人员，<sup>①</sup>有240余人作了研究报告，并有数百人在会上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提问、解答问题或评论，效率不可谓不高。会议结束时，基本上达到了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报告研究成果的大部分是中青年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在校的研究生。与此相比，我国一些学术会议的效率很低，一般在5天至一个星期左右，会议结束时，人们只是认识了一下，学术上的收获往往不大，年轻人在学术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也不多。因此，学术会议的开会，恐怕也是我们今后需要注意和探讨的问题之一。

1987年10月4日于东京大学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责任编辑：严立贤

<sup>①</sup> 会议组织者仅负责征集论文，印刷论文概要集，根据论文内容确定各组会题目、召集人等。参加会议者的食宿交通均为自理（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出差费），而且还要交纳3000~5000日元不等的会议参加费（包括资料费），其他活动另外交钱。